

浅析蒙元与甘青藏族关系的建立及 民族间的友好往来

葛艳玲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河西走廊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走廊。多样性民族文化在同一空间地域内的互动与整合建构了以多元统一为主要特色的河西走廊地域文化。目前,学术界对河西走廊文化的历史建构进程及宏观文化结构的分析构成了对河西区域文化二维平面的认知特点。以民族学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互动的模式加以归纳与分析,以微观研究视角呈现河西走廊多元一体文化结构生成的理论逻辑,以期以河西走廊为研究切片,为民族走廊的研究提供一条立体化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河西走廊;文化互动;模式

〔中图分类号〕K2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1)05-0025-05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后的又一个大一统时代,此时,西藏开始被纳入中央王朝的政治体系,使原来分散割据的藏族地区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元代称甘肃青海藏族为“吐蕃”,他们主要分布在甘肃的凉州、阶州、巩昌、洮州、河州、岷州、宕昌、永昌、山丹、肃州、甘州以及青海东部农业区和西宁、黄南、海南、海北、海西、果洛、玉树等广大地区。经过宋代的大分化、大改组,接近汉族地区与中原经常发生关系者,被称为“熟蕃”或“熟户”,如明初的西宁十三族、岷州十八族、洮州十八族等,与汉族打交道多,从事农耕。而居于偏僻之地不常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者被称为“生蕃”。当然还有不在此两种之内的许多其他藏族部落。随着吐蕃王朝的衰败,藏族已遍布甘肃和青海全省,人口甚多,这是自吐蕃兼并青藏高原各部落之后的第二次民族融合时期,也是甘青藏族与蒙元关系发生演变的重要时期。

一、蒙元与甘青藏族关系的建立

(一)蒙古南征

甘青藏族最早与蒙古发生关系当在成吉思汗时,据韩儒林的《元朝史》记载:在灭夏战争中成吉思汗在灵州击溃西夏主力后,分兵进攻中兴府,自率一军南下,攻占了积石(今青海循化),西宁、洮(今甘肃临潭县)、河(今临夏)这些地区的一些藏族部落可能归附了蒙古^[1]。据史料记载,元太祖二年(1207年),成吉思汗率军南下,先征西夏,攻克斡罗该城,接着成吉思汗进入河西,打败西夏军,进围中兴府(西夏国都,今银川),1226年再征西夏,先后攻占黑水、甘州、肃州、凉州、灵州等城。1227年春,成吉思汗自率师

〔收稿日期〕2011-06-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甘宁青地区多元文化发展与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研究”(批准号:08CSH024)的成果

〔作者简介〕葛艳玲(1980—),女,新疆石河子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

渡河攻积石州(今青海循化),二月破临洮府;三月拔洮州、河州、西宁三州;四月占德顺等州;闰五月避暑于六盘山;六月西夏王李睨降;七月成吉思汗病逝于清水行宫;也有史料说是病逝于萨里川哈老徒行宫(今乌拉巴托东)^[2]。成吉思汗死后,其第三子窝阔台于1229年继承汗位,1230年攻打金国,1234年金灭亡。1235年窝阔台第三子阔端奉命从攻宋前线领兵向西,经略河陇,并将原西夏的西部领土作为其“份地”。阔端筑宫室于凉州,今甘肃河西走廊武威城北,称永昌王。此年蒙古军围攻秦州、巩昌,九月守巩昌的汪世显降。1236年10月蒙古军又破宕昌、阶州、文州,临洮等地,这些地区的藏族部落纷纷归降。唃廝囉后裔原金朝熙州节度使赵阿哥潘和赵重喜父子也降蒙古,阔端命赵阿哥潘为迭州安抚使,招抚甘南、河曲等地的藏族部落,立城堡、课农桑,黄河上游进入蒙元版图。

(二)凉州会晤:拉开蒙、藏民族友好关系序幕

蒙元时期在甘肃最具历史性的活动,便是萨班和阔端在凉州的会晤。在汉文史料中称“凉州会晤”,这次会晤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划时代地开创了蒙、藏两族的友好关系,为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元太宗窝阔台继蒙古国大可汗位后,让其子阔端坐镇甘肃武威,当时,执政者的注意力在西亚和东欧,想以和平方式解决藏区民众的归顺问题。于是,1239年,阔端派道尔达(也称多达那波)进兵乌思藏,蒙古军行进到热辰寺附近,与藏族发生冲突,“公元1239年阔端进入青海,次年(1240年)派道尔达远征入藏,遭到抵抗,遂焚毁热辰及杰拉康两寺。杀死僧众若干人”^[3],至此,这支蒙古军在拉萨一带留驻达两年之久,也再未与当地僧俗势力发生武装冲突,而且还同他们开始了和平接触和交往。由于了解到前后藏僧俗割据势力以及藏传佛教各派间势力交错,蒙古军队长久派兵统治难以实现。不久,蒙古军即撤出乌思藏,这次进军虽然没有结果,但其影响却是很大,一方面乌思藏方面意识到了蒙军的强大,蒙藏间的关系绝不是以武力所能解决的,决定派人与蒙古军接触,从而确定与蒙古的联合。另一方面,蒙古军也了解到藏区的形势,“现在卫藏地方,以噶当派的寺庙最多,分布最广;达垄教派(即达垄噶举)戒律清整,富有德行;止贡派(即上贡噶举)的京俄大师最有法力;萨迦派的班督达(即萨班)通晓‘五明’。请主公设法延致之。”^[4]至于迎请谁,蒙古当时也在做选择。蒙元对于自己征服和打算去征服的地区,采用笼络当地首领或宗教领袖来帮助其统治的策略,这也是成吉思汗一贯采用的政策。此政策对藏关系上也是如此。据《西藏王臣记》载,最早迎请的是止贡派的京俄大师,但京俄谢绝了。后又以皇子的函札和敕令给萨班,派道尔达和杰门带着礼物和信件,邀请萨班到凉州去和阔端见面商谈“卫藏归顺蒙元”之事,迫于形势,萨班不顾64岁高龄,于1243年带着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二人前去凉州,经过三年的跋涉,于1246年八月到达凉州,萨班到达时,阔端不在凉州,而在和林参加选举大汗的会议,他们次年才会面。也就是1247年年初,萨班和阔端在凉州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阔端代表蒙元汗廷,萨班代表西藏地方,共同议定了归附条款:“一、各地世俗首领,官仍原职;二、任命萨斯迦首领为大鲁花赤,赐金、银符;各地官员处理政务应请示萨斯迦长官,不许自由行事;三、各地编出籍册,开列官员姓名、俗众人数和贡赋定额,一式三份,一份进呈,一份交萨斯迦,一份由本地官员保管;以后由朝廷官员与萨迦官员共同征收国赋。”^[5]阔端与萨班会晤后,对萨班印象极好,认为他不仅有萨迦派教主的地位,而且佛学知识渊博,阔端扶植萨迦派,命其管理西藏一切政教事务,萨迦派从而取得了在西藏各地方僧俗势力中的领导地位。阔端还特意在凉州为萨班修建了幻化寺,作驻锡之所。双方在取得一致意见后,由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僧俗领主的公开信,即《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凉州会谈揭开了蒙藏关系史上新的一页,“这次会晤是历史上一项重大的事件,它关系到后来元代中央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奠定了西藏地方直辖于中央的基础。”^[6]当然对甘肃、青海藏区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从此,青藏高原各地包括西藏,完全统一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7]。

谈到此,很多人会想萨班为什么会接受阔端的邀请并签署协议呢?

其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考虑,首先,他看到蒙古军事势力的强大,而西藏由于地方割据、长年战乱处于弱势,僧众领袖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不抱幻想归顺蒙古是大势所趋;其二,是考虑到阔端邀请他是为了让他在西夏故地发扬佛教,西藏地区藏民较为集中,而甘青藏族分布较散,其宗教影响力较弱,从藏民的

信仰角度出发,甘青地区正需要像萨班、八思巴那样有学问、有道德、有远见卓识、有谋略的宗教“四有”领袖出现,所以,当时的情形下,萨班也就接受了阔端的邀请并签署了协议,使萨迦派成为了政教合一的集团势力。处于政治上、军事上的需要,蒙藏的联系愈加紧密,这是一种富有政治和宗教色彩的联盟。

凉州会谈成功,西藏归蒙元直接统治,萨迦派作为蒙古王室代理官员“达鲁花赤”行使职权,“各地长官亦毋不与萨迦金字使议而擅权做主”,蒙元结束藏区持续400年的各自为政,四分五裂、不相统属的局面。该会谈也避免了因武力征讨藏区带来的破坏和流血牺牲,使西藏及甘青藏区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二、蒙元在甘青藏区的施政

1259年7月,蒙哥汗在四川死于战事,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继帝位,改国号大元,封八思巴为国师,中国再一次实现了统一。蒙古对广大甘青藏区的统治,在成吉思汗时得地不守,窝阔台时把原西夏领土封给阔端,命他经略,蒙哥时在河州设吐蕃宣慰司管理安多藏区事务。“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吐蕃之地”,忽必烈时始定官职和宗王镇守制,推崇喇嘛教,推行政教合一制度。

(一)宗王的分封和帝师制

1269年,忽必烈封第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以吐蕃为封地,置府算木多,镇守青海和吐蕃(甘肃青海牧区),奥鲁赤死后,他的长子镇西武靖王铁木儿不花和他的孙子承袭这块封地,“足见蒙元时期西藏始终是元世祖第七子一家的采邑。”^[8]通过这三系宗王镇抚吐蕃可以看出,“阔端一系是驻守甘肃西部,忙哥刺一系是驻甘肃东部,奥鲁赤一系是驻四川,这样完成了对吐蕃自北至东半圆形的部署,这些宗王可能不直接管理吐蕃,但吐蕃是处于他们的势力和影响之下,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元初受西宁州分地的章吉驸马,也是镇抚吐蕃的一个单位”^[9],镇守湟水和庄浪河一带的是弘吉剌部的章吉兄弟,弘吉剌部与蒙古王室世代为婚姻。镇守撒里畏吾儿地方即今青海柴达木西部草原和甘肃敦煌一带的为宁王卜烟帖木尔。镇守关陇和唐兀(今河西、宁夏)地方的是忙哥刺及其子孙。1264年忙哥刺率军驻六盘山,在固原西南开远堡置府,1272年封为安西王,其子阿难答袭位后,驻河西走廊,是西北最大的藩王,后阿难答夺权失败,皈依伊斯兰教,其部众15万人大半信奉了伊斯兰教,阿难答死后部众散河州东乡者,后来形成东乡族^[10],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诸王的权利逐渐削弱。

帝师制是元朝统治吐蕃地区的另一项重大举措。由于吐蕃地区信奉佛教,据《元史·释老传》忽必烈采取“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策。即位后即封八思巴为国师,“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11]《元史·释老传》记载:“[世祖]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1272年元设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帝师领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并把乌思藏十三万户僧俗和吐蕃三地面^①连同其地僧俗都赐予他。帝师的职责《元史》记载为“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佛教之印”。这样八思巴既是最高宗教领袖,又是吐蕃地区统领者,正像《元史》所说“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从八思巴受封为帝师,经元历代都有帝师之职,据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统计共有十多位帝师。八思巴在甘肃凉州建立寺院,发展藏传佛教,后来还长期住于临洮,对今甘南一代藏传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当地许多寺院都被认为是八思巴修建的自京师到藏区的108座寺院之一,并以此为荣。

(二)元代在甘青藏区的行政机构。

元二十五年(1288年)在吐蕃建立了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统治机构。在中央设有宣政院,在地方(甘青广大牧区)划吐蕃为三道:一是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朵思麻宣慰),主要管辖今甘(甘南河州一代)、青(青海中东部)藏区和四川阿坝等地,治所在河州(临夏);二是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朵甘思宣慰司),主要管辖今四川甘孜州和西藏昌都地区一部分,治所在甘孜一带;三是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乌思藏宣慰司),管辖卫(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藏(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阿里等地。具体管理藏族地区的军政事务。在藏族聚居的农区,则设同于内地的省

^① “吐蕃三地面”指: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即西藏、康区和安多。

路府州县,用汉法治汉地,依藏俗治藏人。

(三)清查户口、设置站赤

清查户口、设置站赤——驿站,其目的是“通达边情,布宣号令”进一步加强对藏区统治。

元朝在吐蕃清查户口是在阔端通过萨班给乌思藏的信中提出的。忽必烈即位后,就派遣由总制院使答失蛮率领的一批官员到乌思藏调查户口,1268年正式进行土地和户口的清查,这次清查不仅仅限于乌思藏,还包括青海和四川西部的地区。对吐蕃广大地面清查户口,是从朵思麻开始的,“薛禅皇帝之时,在对吐蕃广大地面清查人口户籍时是从朵思麻开始清查的。”^[12]这次清查乌思藏各地平民数为32301户。

至元二十四年,元朝又派遣官员进行第二次清查并在此基础上划分了站赤。1269年,忽必烈派人按照人口的多少,地方出产的贫富,道路的险易,仿照汉地驿站制度,在藏区设立了二十七个大驿站,其中朵思麻设七个,朵甘思九个,乌思藏地区设十一个。驿站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单独系统,不隶属于当地的万户,每站有朝廷设一站官管理,驿站的事务,由宣慰司报宣政院。在灾荒、战乱时中央还拨款赈济。元朝派大臣到吐蕃地区办理大事,往往以“治邮传”为一项要务。

在清查户口和人口,设立驿站的基础上,确立了藏区承担的赋税和徭役。元代甘青地区藏族承担的赋税有:差发(即赋役)、乌拉等。阔端时,在甘青藏区实行有马百匹,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牝牛一,羊百者,输羖羊一,称“羊马抽分”制度,以后推广到全国。1285年,甘肃行省设“西宁州等处拘榷课程所”负责税收与转运事,牧区以马为赋,农区以田为赋即杂税,“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赋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13]杂税达三十多项。乌拉也是差役的一种,蒙元甘青藏族“家有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金为兵”^[14]。其他的赋税方式在此就不一一列举。这些举措大大加重了支应户的负担。

三、蒙元时期甘青藏区民族间的友好往来

(一)贸易往来增进了甘青藏区民族间的交往

在元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崇下,通过萨迦本钦指挥西藏十三万户,从而结束了青藏高原近四个世纪分裂割据的混乱状况,在相对稳定、统一的局面下,蕃人休养生息,甘青藏区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同时内地的印刷、建筑技术先后传入藏区,藏区的塑像、造塔、工艺美术等传入内地,形成了历史上继吐蕃王朝之后又一个发展高潮。

甘青藏区与其他藏区相比,自然条件较为优越,并较早的得到了各族人民的开发,社会经济相对繁荣,甘青藏族以畜牧业为主,尽管在秦、巩等地的藏民受到汉族农耕文化影响,部分部落已从事农耕生产或半农半牧,但数量较少。河西藏区自古有“畜牧为天下饶”的美称,甘肃良马,包括河西马、甘南马,历来驰名中外,甘肃藏区处于中西交通要道,利于开展内地与西域的贸易,甘肃地区的藏族又临近内地,与其他民族的联系比在西藏时密切。

甘青藏区的汉、藏、蒙等民族间的“茶马贸易”极为兴盛,蒙元时期甘青藏区民族间的友好往来除表现在经济贸易上外,还表现在文化上,特别是宗教文化方面的交往也较以前增多。在甘青地区,汉传佛教的传播要早于藏传佛教,但这也恰恰为藏传佛教在甘青藏区的传播和兴盛奠定了基础。

(二)藏传佛教各派及其佛教艺术的传播使甘青藏区民族间的交往进一步加深

宋末,噶举、萨迦、宁玛等派已传到甘青藏区,蒙元时代,凉州会晤以后萨班便在凉州弘法,兴建或扩建了白塔寺、南灌顶寺、西莲花寺、海藏寺等。八思巴等萨迦派高僧在卓尼、甘加、凉州弘法,同时噶举派的高僧也在凉州、甘州、和宁夏一代传法。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曾在汉藏交界处的临洮筑行宫,管理安多、康、藏三大区域,促进甘青藏区藏传佛教的发展。在甘南藏区,他实行抑苯倡佛的政策,1254年令萨迦格西喜饶益西在卓尼建寺,即禅定寺之始。元代萨迦派寺院以卓尼和凉州为中心,向各地传播发展。

在甘肃省祁连山北麓居住的裕固族早在唐末、五代时期就与居住于此的藏族有了接触。随藏传佛教的传入,两个民族的交往逐渐密切,藏族文化也逐渐向裕固族民族渗透,进而对裕固族的社会生活产

生了影响。元时,裕固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萨迦派^[15]。裕固族平时的婚丧嫁娶、礼节问候都带有浓厚的藏族文化,有些裕固族的姓名是藏名且具浓郁的宗教意味。裕固族虽有自己的语言,但其中也吸收了不少藏语词汇。宗教用语则基本上是藏语,所用佛经均为藏文经书。公元15世纪以来,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土族地区传播并盛兴。就土族语言来说,可分为互助(包括青海大通、甘肃天祝等)、民和以及同仁三大方言区。但无论哪一方言,历史上与藏语的关系都十分密切,土族语言中吸收和融合了不少藏语(安多方言)的成分。土语中有关宗教的词语,基本上借用了藏语^[16]。藏传佛教在其他民族的传播也使得甘青藏族与其他民族间的交往不断加深。

甘青藏区在封建化的过程中,与佛教的传播发展联系紧密。不论是宋代还是蒙元,统治阶级都积极扶植佛教,其一是利用高僧大佛,封予职位,参与施政;其二是广建寺庙,传播教义,尤其是佛教“普度众生”、“利乐有情”、“众生平等”等思想,对战乱中的人们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其三是佛教从统治阶级走向民间,成为统治阶级维持其政权的一种有利工具^[17]。从“凉州会晤”到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再到任命八思巴为国师,僧人的参政议政,无不是封建领主将政治统治、经济剥削与神权代表的身份集于一身,而僧人受命于朝廷,也提高了僧人在藏区社会中的权威,加强了藏区分封隶属关系,藏区也相对趋于稳定。

蒙元时期开凿敦煌千佛洞窟五个,其石窟艺术与藏传佛教壁画艺术的内容、形式、风格一脉相承,系出自藏族画家之手,可以说敦煌是由宁玛派护持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说唱本,不仅传至甘青藏区,而且逐渐传至蒙古及其周边民族,使藏族艺术发扬光大。由此可见,藏传佛教及其艺术在甘青藏区的传播不仅推动了民间民族文化自身的变革,也拓展了民族间交往的空间,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也总是在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传播中得以实现。

四、结 语

蒙元对甘青藏区的统治,单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看,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蒙元将西藏纳入中国统一版图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甘青藏族的统治,蒙藏与其他民族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为紧密;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角度来看,通过设驿站、建立地方机构、清查户口、贸易通商、宣扬佛法、广建寺庙石窟等举措,和平解决了西藏及甘青藏区的问题,中央行使了主权,地方得到了发展,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得以实现。甘青藏区“经过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几十年的经营,结束了自唐中叶以后的氏族纷争和血战,实现了祖国历史上又一次大统一”。这有利于甘青藏区的发展。以史为鉴,蒙元时期的甘青藏区政策,对当下我国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也提供了借鉴,“用汉法治汉地,依藏俗治藏人”,也是当今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以实施的最好印证。

参考文献:

- [1][5]韩儒林.元朝史[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64,251.
- [2][17]洲塔,乔高才让.甘肃藏族通史[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226,268.
- [3][11]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M].刘立千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225-233,233.
- [4]黎宗华,李延恺.安多藏族史略[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10.
- [6]《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33.
- [7][10]半一之.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390,395.
- [8]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J].历史研究,1958,(8).
- [9]扎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M].台湾:台湾正中书局国立政治大学丛书,1980.176.
- [12]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 [13]元史·食货志[Z].
- [14]元史·兵志[Z].
- [15][16]赵永红.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及影响[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6,(6).

(责任编辑 杨士宏 责任校对 马倩)